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6.010

#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确立与新时代传承 ——论两次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联系

罗新河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文艺体制化的开创性文件, 其中奠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红色传统和文化基因, 在新时代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富于时代意义的传承与发展, 其突出表现在立足于现实的问题意识、坚定的人民立场、强烈的国族认同等三个方面。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传承发展, 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面对现实、人民和民族三个基本维度的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 其在以文化强国、民族复兴为指归的新时代文艺建设中发挥着指导性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 习近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6-0078-06

##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arxist 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Its Inheritance in the New Era: On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peeches” at Two Forums on Literature and Art

LUO Xin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Speech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is the pioneering docu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CPC's literature and art. The Marxist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and cultural genes laid down in it have been well inherited in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New Era, highlighting three aspects: a problem consciousness based on reality, a firm stance on the people, and a strong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ati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from Mao Zedong's “*Speech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shows the CPC's consistent core concept of literature and art facing reality, people and nation, which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with cultural power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its direction.

**Keywords:** Mao Zedong; 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Speech at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收稿日期: 2024-07-02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中的钱钟书人文实践研究”(23YBA163)

作者简介: 罗新河, 男, 湖南株洲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艺。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它是中国共产党文艺体制化的开创性文件，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性质与发展方向。71年之后的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发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目前，学界对两次讲话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不过，其多就讲话学理、论点异同、讲话意义等予以分析探讨，专门梳理两者之间根本精神联系与思想传承的成果并不多见。通过对两次讲话深入的比较研读，我们会发现，这一点其实是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其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权”与“经”的统一。其既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也反映了客观规律，闪烁着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立足新的历史文化语境，就这一点进行深入阐释，无疑有利于深入理解党的文艺理论与政策在新时代的发展态势，加快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

### 一、问题意识：“从实际出发”到“问题导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sup>[1]853</sup>这篇讲话中的文艺思想就是毛泽东洞悉当时党的文艺发展历史事实、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延安文艺发展现状等历史与现实情况之后，针对革命文艺发展的突出问题提出的，其体现了他从实际出发的的工作方法和逻辑理路。

讲话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文艺如何与现实结合的宏观问题，指出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几十年来，虽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但与革命战争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在革命根据地也没有与“人民群众完全结合”<sup>[1]847-848</sup>。其具体反映在一系列言论和观念上，如：“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

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等等。这些言论和观点正是“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sup>[1]870-875</sup>的表现，是一个个具体的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其导致文艺与革命工作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有效地“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一系列问题，如“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sup>[1]848</sup>，它们都包含在“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与“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sup>[1]865</sup>之中。

据统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问题”一词的出现达到惊人的103次，可以说，整个文献都是由问题组成的，这充分说明它的问题意识之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全部理论成果，就是从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真理性认知，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毛泽东思想建构的最大特点之一。

从现实问题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在习近平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他把“坚持问题导向”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工作方法，指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sup>[2]</sup>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他特别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sup>[3]</sup>，而“坚持问题导向”正是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工作方法。他明确表示：“我讲5个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sup>[4]</sup>对这五个问题

的分析与探讨构成了文章的基本框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是首要问题,这是因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其政治经济地位并不匹配,中国的文化工业、文化产品、文化标准以及价值观在世界上影响力还远远不够,离文化强国的距离相差甚远。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中国文化作出相应贡献,这是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最大现实问题,也是最大的目标与任务。后面四个问题,都建立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需要从不同方面、不同途径来寻求解决答案。这四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一系列具体的现实文艺问题。比如,在文艺创作上,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反映在具体作品中,就是有的作品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作品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作品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有的作品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有的作品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作品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等。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有的人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使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沾满了铜臭气,他们将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作为艺术衡量的指标。在对待文化传统上,有的人缺乏民族自信,“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sup>[4]</sup>。在文艺批评上,流行圈子批评、自我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往往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sup>[4]</sup>。总的来说,文艺界普遍充斥着浮躁的现象:“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sup>[4]</sup>这种浮躁的心态所导致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从以上四个大的方面严重影响、阻碍着中国文艺的发展,构成中国新时代文艺发展的症候。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文艺界的广泛调研和了解,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抓住了文艺

发展的要害,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地进行研究和解决,给文艺界提出了任务、要求,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方向,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新成果。这种从现实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来推进工作的务实的作风和方法,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基本方法,是对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 二、人民立场:从“人民性”到“以人民为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sup>[1]848</sup>党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是一致的。党的文艺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党的立场决定了党领导下的文艺的立场,也是人民的立场。换言之,党的文艺最根本的性质就是人民性。

文艺的人民性本质,决定了文艺的服务对象、表现对象、内容构成、表现方法、艺术形式、创作主体、艺术来源、接受主体以及语言等文艺的各种范畴的人民性。当然,人民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在革命战争年代,“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sup>[1]855</sup>其中最主要部分是工农兵。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阶段,党的文艺主要就是指工农兵的文艺。作为无产阶级的工农兵是一个社会阶层,代表着深受压迫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希望“站起来”的人民。经济上贫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同时文艺又肩负着对阶级、民族敌人的斗争任务,这是当时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所立足的社会状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存在决定意识,因此要创造真正的工农兵文艺,文艺工作者必须工农兵化,必须进行工农兵改造——无论是外在的物质形式,还是内在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以及文化生存方式。毛泽东文艺观的人民性,是其政治观上的人民性和群众路线在文艺上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特定时代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进入了强起来的历史阶段,

但人民仍是党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命题，人民的“中心”地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前面两个问题讲的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人民需要文艺表明了文艺对于人民的重要价值，文艺需要人民显示了人民在文艺的发生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其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客观事实以及文艺发展的本质规律。第三个问题是对文艺提出的要求，是前面两个问题的逻辑发展，其从主观层面强调了对党的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态度和要求，体现了我党在文艺观上的人民本质，是人民性观念的真正落实。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是其站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性文艺观的继承，体现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也深刻表明了党的文艺思想一以贯之、薪火相传的历史延续性，但同时基于时代变化的现实，后者对于前者也有着发展、丰富和深化，具有自己独特的禀赋。

其一是突出了人民对文艺的意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特定时代背景和任务，首先强调的是文艺对人民的直接作用，特别是对革命工作的作用，因而对前两点更为重视。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突出了人民对文艺的意义。这一点虽然在前者中也有论述，比如提出了著名的人民艺术源泉论，但逻辑理路却是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框架下展开，可归属于后者所提出的“人民需要文艺”“文艺要热爱人民”的论域范畴之内。习近平的讲话将文艺需要人民特别提出来，单独论述，将这一问题凸显出来。后来他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sup>[5]</sup>；在《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也表示，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sup>[6]</sup>。其不是单纯强调文艺的作用和政治功利性，同时也突出了人民对于文艺发生、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人民创造历史、创造文艺的客观事实和规律。

其二是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人民内涵更为丰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其中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是指除极少数敌对分子以外的全体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干部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后来，江泽民在阐述“人民”的内涵时，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概念。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展了新时代“人民”的内涵，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变成“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相比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的内涵在不断变化、丰富，这是时代社会政治变迁和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必然结果。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代，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取得了极大进步，新时代的人民是文化程度更高、精神需要更多样化的人民。

其三是人民性成为艺术评价的直接标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文艺批评的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人民的标准包含在政治标准之内。《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提出了文艺评价的标准，或者说是“观点”：“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sup>[4]</sup>。其由前者的两个标准扩展为四个标准，单独把人民的观点提出来了。相比政治的观点，人民的观点更为明确、具体，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和突出。

### 三、国族认同：从民族文艺自觉到中国文化自信

民族—国家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关键词。近现代中国社会，外敌入侵，国家衰败，文化危机深重，如何重建中国民族认同，使之成为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驱动力，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伟大而艰巨的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呼吁，自觉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作为党的领导者，毛泽东一直都在自觉规划和设计现代中国民族认同。在抗日战争语境下，他不仅把文艺作为认同建构的重要内容，更使之成为激发与促进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效手段与力量。

在1938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

中国气派。”<sup>[1]534</sup>在1939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包括“民族化(包括旧形式)”<sup>[7]</sup>在内的新文化四大口号。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并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sup>[1]706</sup>这种特性,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它建基在民间的、底层的文化文艺基础上,同时合理利用和改造旧的、传统的形式,并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

1938年4月,徐懋庸发表《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一文,毛泽东对其中高度肯定文艺工作者采集民间艺术形式的做法并相信它对于中国新艺术的发展必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的观点深表认同,称赞文章“写得不错”<sup>[8]</sup>。显然,此文的主张一定程度也代表着毛泽东的观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他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sup>[1]851</sup>“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sup>[1]863-864</sup>为此,他批评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错误倾向:“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sup>[1]857</sup>可以说,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民群众的语言、艺术形式、民歌、民间故事等,都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创造和熟悉的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体现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具有最典型的中华民族的特征。这种认为民间文艺与民族文艺存在一致性的观点,体现了毛泽东将文艺的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文艺思想。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民族的新文化,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也应该采取一种批判吸收的态度:

“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sup>[1]707</sup>,对其加以合理的利用与改造。他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sup>[1]855</sup>同时,他明确指出:“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sup>[1]860</sup>显然,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不能形而上学、机械教条,而是要批判继承与利用,在民间化、传统化与国际化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在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状态、政治经济濒临崩溃、全盘西化潮流盛行、社会陷入严重文化危机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丧失民族自信心,放弃民族自我,而是仍然自觉地以民间形式、传统文化作为基础来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充分显示了文化拯救者的勇气与担当。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从民族文艺自觉到中国文化自信,显示了我党对待本民族文化的逻辑,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为后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和民族“硬的经济和军事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sup>[9]</sup>。物质的成功会带来文化的伸张,硬实力会衍生出软实力。当今时代,中国社会早已度过备受欺凌、灾难深重的阶段,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已经强起来,正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繁荣昌盛的第二个100年迈进。国力的强盛为中国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支撑,中国社会和知识界不断从民族文化中探究国家发展壮大的根源,寻找两者的必然联系。这一文化趋向与贫穷落后的近现代社会形成强烈反差。中国、中华民族不再是落后、贫穷的代称,与此同时,西方中心主义不断受到质疑和解构,中西关系的不平衡状态和局面得到逆转。党中央提出的文化自

信战略正是这一情势的鲜明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sup>[4]</sup>文化自信体现了国家、民族的归宿意识和身份认同，是对本国、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高度认可与肯定。坚定文化自信，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进入新时代的必然结果和必要步骤。

文化自信首先表现为对中国精神的弘扬与肯定。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他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sup>[4]</sup>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到充分继承与体现，而在其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因此，他号召“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sup>[4]</sup>，主张通过文艺培养国族认同意识。

中国精神既是内容层面的中国人的“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同时也是一种“中华美学”，因此在文艺上体现中国精神，关键在于“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sup>[4]</sup>。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号召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sup>[5]</sup>。在《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说，“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sup>[6]</sup>。

弘扬中国精神，塑造中国形象，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反对和消除从近代以来就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热衷于“去思想化”“去

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以突出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存在——强化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以激发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从而助推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使之走向伟大复兴。这种以“文化自信”为内在诉求的文艺发展观，顺应了中国现实政治经济发展和文艺自身发展规律，是强起来的中国在文化、文艺发展策略上的必然选择和结果，是中华民族百年来现代认同发展历史的重要环节与内容。

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sup>[4]</sup>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烈抵制“全盘西化”潮流，自觉规划设计“民族的”新文化，重视人民本位的民间艺术形式，主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到中国强起来的新时代，习近平坚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文化自信，要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凸显“中国”属性，显示了中国文艺从自觉到自信的建构现代民族认同的一脉相承的逻辑理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本土，结合民族实际，建设中国人民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的持续努力和坚定信心，同时也为世界各国贡献了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特的声音和成就。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基于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时代背景，因应时代命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文艺建构思想和理念，这一点在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充分承继，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获得进一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最新理论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它表明了我党的文艺事业代代相传、不断创新、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逻辑与内在动因；同时，其深刻启示人们，中国文艺的发展只有面向现实和时代命题，扎根人民，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并在民族、民间的文化土壤上，合理利用和借鉴传统和外来文化，才能得到健康、蓬勃的发展。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

(下转第99页)